

特約撰述

十九世紀末朝鮮與東北亞地緣政治

Korea and Northeast Asian Geopolitics in
Late-Nineteenth Century 1875-1905

蔡東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壹、前言

朝鮮半島位於亞洲大陸東北部，自西北向東南延伸，全長 1100 公里，總面積則約為 22.2 萬平方公里。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的將近半個多世紀間，在半島上或為了此處利益，曾先後爆發 3 次重要國際戰爭：1894-5 年的甲午戰爭（日本稱為日清戰爭）、1904-5 年的日俄戰爭和 1950-3 年的韓戰。值得注意的是，如同世界上其它半島區域一般，朝鮮半島既為連接陸地與海洋的橋梁與跳板，此地緣特徵亦成為制約其對外關係的關鍵所在，且戰爭主角都並非半島本身，亦暗示了此地區複雜之國際地緣背景。

十九世紀末期東北亞的國際局勢發展可被比擬為一首複雜的樂章。主旋律是中日衝突和東北亞霸權更迭，副旋律是俄國企圖伸展影響於此的努力，至於英美等國只能算是短短的插曲。曲子的進行雖沒有真正令人震撼的波瀾壯闊場面，其影響卻是餘音繞樑，久久不息。

其中，此際中國所處地位極其特殊，例如在 1894 年以前，即便西力東漸，中國仍是東亞霸主，之後日本雖取得平等地位，尚未必超越中國，但日俄戰爭則證實了區域霸權已然讓渡，中國只能任憑他國在自身國土作戰並劃分勢力範圍，儼然待宰羔羊；不過，到了 1950 年韓戰爆發後，中共志願軍又成為積極參與者，甚至迫使美國簽下停戰協定，從而見證了歷史起落浮沈。

無論如何，本文將以朝鮮為中心來探討此一時期的發展；事實上，十九世紀末期東北亞的「新聞焦點」亦於在此。時間起點是日本在 1875 年藉口「江華島事件」開始涉入朝鮮事務，直到 1905 年日俄戰後的《樸資茅斯條約》奠定日本對半島宰制地位為止。至於討論重點包括：(1) 以半島為中心之國際權力結構分析；(2) 引起利益爭奪的誘因；(3) 各國的競爭手法及政策背景；(4) 導致主要國家權力消長之根由。

貳、清廷之朝鮮半島政策態度

此際朝鮮與中國之交往，存在某種從屬關係；清廷政府是朝鮮名義上的宗主國，而根據傳統「宗藩」概念，必要時可（被動）干預其國防外交，但儘量不涉入內政。於此同時，日本則相對扮演著挑戰者角色，並緩緩推動著三邊關係之質變。例如，1875 年（光緒元年）12 月總理衙門〈奏與日本使節辯論片〉中便提到：「朝鮮向為中國藩服，日本應恪守條規，不得占其邦土」，同摺附件〈覆日本國節略〉中也說道：「中國之於朝鮮，固不強預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安全」；從某個角度來說，或許正因中國傳統外交之消極特質，為日本擴張提供了「見縫插針」的機會。

進言之，清廷之朝鮮政策可歸納於兩端：第一是「威望」；第二是「安全」。必須說明，此處所謂「威望」(prestige)並非如 Hans J. Morgenthau 在《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中所言：「一國的外交政策，永遠是在某一歷史時刻對於現存於不同國家間權力關係估計的結果，此種估計也包括對現存權力關係在不久以及遙遠的將來可能發展的估計。……威望政策的作用，正是在影響這些估計。」Morgenthau 前述這種「現代意義」下的威望政策，既基於權力平衡關係之推衍，主要亦指對外政策而言，但清廷的「威望」利益同時兼具對內與對外性質，甚至對內意義或許更大一些。

在對外方面，主要在於維繫影響中國達千年之久的「華夷」秩序觀念，其內在意涵為所謂「天朝觀念」，支撐骨架則是「宗藩」關係和「朝貢」體制，至於朝鮮加入此一體系起源不僅甚早，近代過程則始於 1385 年(明洪武 18 年)，自此，朝鮮一直奉中國正朔(正統王朝年號紀元，甚至「朝鮮」國名也由朱元璋所取)，並以接受「冊封」成為藩屬(附庸國)。清廷對朝鮮負有「照料」義務，後者則經朝貢既分享了中國的安全保障、正當性輸送與經濟成果，更重要的是，清廷可將藉此獲取之「威望」轉化為對內統治的「權威」，進而鞏固其統治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朝鮮身為宗藩關係一環而提供給清廷的威望利益，絕非中國政策重心，更關鍵者還是安全因素；清太宗在 1637 年征服朝鮮便是一例。正因朝鮮距滿人「龍興之地」滿州(東北)近在咫尺，且歷代朝鮮政權又為中國外患之一；為當時之安全計，同時為了在入關之前剪除後患，先征服朝鮮乃必然之舉。至於在滿清入主中原後，為保障滿州安全，維持與朝鮮關係當然更重要；事實

上，蒙古對清廷之地緣意義同等重要，只是此時受俄國鯨吞蠶食情況暫不嚴重，朝鮮問題便首先被凸顯出來。可以這麼說，前述這種重要性表現在政策上，徵顯出來的便是廷論意見之一致：例如，清朝末年的三大藩屬問題（琉球、朝鮮、安南），惟有朝鮮問題達成全體主戰的共識。無論統治階層、技術官僚或清流派知識菁英，都認為朝鮮是與中國休戚相關的「重大利益」（vital interest），由此可見其象徵意義。

不過，在此同時，我們亦不可忽視朝鮮本身的態度。儘管清廷擁有名義上的「宗主」地位，實則朝鮮擁有完全自主能力。尤其在 1863-75 年朝鮮政局顯現出衰落前夕動盪不安之際，大院君（皇帝生父）和閔妃（皇后）的權力鬥爭乃衝突主線，至於日本則提供了外來挑戰與主要變數。經過長期同化或某種文化採借，朝鮮與中國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頗為近似，同樣對外來挑戰採取堅決排斥，甚至建立刻有「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之「斥和碑」。儘管對外關係在 1875 年之前仍屬次要範疇，內部政爭才是主要課題，但這兩者的發展在後期又密不可分，由於政爭雙方各自試圖引進外在勢力以強化自身陣營，致使以「事大黨」和「開化黨」為首的兩大派系讓朝鮮與半島情勢進入了一個嶄新時代。

參、中日競爭與甲午戰爭

從 1637 年成為滿清藩屬，一直到 1869 年的 232 年間，朝鮮半島秩序呈現了相對穩定的發展。除了自理內政，惟一外交要務只有按時向中國朝貢；於此同時，除了作為中國忠實附庸，朝鮮另一附帶工作則是擔任中國與日本之間類似溝通站的一種橋梁角色。基於

中國長期文化與結構優勢，前述三角結構一度相當穩定和諧，直到 1850-60 年代才浮現某種根本變化。

轉變的根源與主角是日本。在 1854 年與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條約》後，日本進入了「開國」時期與急劇發展之現代化歷程，整個社會無論道德秩序、知識基礎和國際觀念都有了巨大不同。邁向轉型期的日本展現了無比韌性和吸收力，且即使內部意見紛紜，對外政策卻逐漸統合步調。其中最大改變在於，日本由江戶封建階段之採取鎖國政策，轉而以對外擴張作為「生存」戰略主軸。

擴張修正主義者日本的出現，無疑使東北亞權力結構由「合法性」(legitimate) 轉為「革命性」(revolutionary) 體系，至於日本地位轉化則提供了主要變數。

在此先概略說明十九世紀末以前的日本外交環境。在江戶幕府時代 (1603-1867)，日本對外互動可分為 3 種，亦即「通交」(建立邦交並互派使節)、「通信」(雖無邦交，但互通「信義」) 以及「通商」(在規定範圍內存在貿易關係)。事實上，前述第一類國家並不存在，第二類如朝鮮，第三類則如中國和荷蘭等。由此可見，中日政府間關係並不密切，而藉著互派「通信使」，朝鮮的橋樑地位既被凸顯出來，也由於對朝鮮具深入瞭解且目標在借道前往中國 (如同豐臣秀吉在 1592-98 年發動萬曆戰爭，日本稱文祿慶長之役)，於是半島便成為其擴張第一目標，此即所謂「征韓論」，至於早期代表性人物是木戶孝允，他曾在 1869 年強調：「希望速定天下之方向，遣使至朝鮮，問彼之無禮，若彼不服，則鳴其罪，攻其上，以大張神州之威。屆時，則天下之陋習必焉一變，遠定目標於海外，隨之百工器械真正與事俱進，一洗競窺內部，謗人之短，責人之非，而不

自省之習惡。至於必將廣增國土，自不待言。」

此處所指朝鮮的「無禮」是在木戶報告後，大院君以日本敕書中「大日本國皇帝」字樣為由，將其使節宗重正逐回，甚至以日本與西方往來有若禽獸，發布了「與日本人交際者處死刑」禁令。可以這麼說，首先，朝鮮此舉完全合乎中國式判斷標準，亦代表兩國之某種共同陣線意識，其次，前述舉措無疑加深日本的敵意，並使後者掌握了出兵藉口。

無論如何，畢竟清廷此刻仍屬東亞舉足輕重的霸主，致使日本的西進政策不能毫不考慮中國因素。於是藉換約之便，副島種臣在1872年探詢了清廷對半島局勢的意見，不料後者答覆只是：「中國對於朝鮮，雖與封冊及正朔，然其內治與和戰，皆朝鮮自主，與中國無關係。」對於中國的華夷宗藩秩序觀，日本當然瞭然於胸，但此刻卻故意聽不懂，改以西方標準來理解上揭陳述，於是朝鮮「成為可完全獨立自主之主權國家」，日本則準備運用西方條約體系準則來調整與朝鮮的關係。

據此，最後一道關卡只剩下朝鮮的態度；正如美國以炮艦打開日本門戶，後者也決定用強硬手段克服。1875年，日本以江華島事件為由，派遣黑田清隆和井上馨赴韓談判，同年簽訂《日朝修好條約》（江華條約），關鍵在於第一條：「朝鮮是自主之邦，與日有平等權利」；這不啻否定了中國的宗主權。

如果說《江華條約》讓東北亞三角關係暗潮洶湧，1882年的壬午開化黨政變便使得整個衝突檯面化：最重要且明顯象徵便是中日的同時分別出兵。中國的舉動有其朝貢體系下的合法解釋基礎，日本出兵則表現了挑戰者的動機。事變後的《濟物浦條約》為日本提

供了駐軍的藉口，至於在 1884 年甲申事變後，次年的中日《天津條約》又讓日本出兵獲得合法基礎，就外交技術而言，當屬清廷一大失敗。當然李鴻章曾有如下預言：「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其後果然言中！

於此同時，朝鮮內部陷入劇烈動盪不安，派系分裂顯而易見且十分複雜，並各自拉攏中日以為奧援。由於看似尚無明顯立即的危險，中國對朝鮮態度起初十分消極，直到日本於元山開港而清廷改派袁世凱駐韓後才轉而積極。大體言之，中國此刻的基本政策乃引進西方勢力抵制日本，日本則忍耐等待機會來臨，最後在 1894 年以甲午戰爭爆發而決定了半島的命運。

在 1894-95 年中日戰爭中，一般認為，清廷失敗主因乃信心不堅且政策紛歧所致，甚至慈禧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更是造成北洋海軍瓦解之背後黑手，真正原因還是概念問題：中國雖瞭解現代化的好處，但內心深處並不認同，事實上，正是此種保守心態及其支撐之一套中古政治運作模式鞏固了慈禧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並沒有因這場戰爭而取得了宰制朝鮮的地位，最多只是驅走或排除了中國的影響罷了。

肆、後中國時期之日俄衝突

藉由 1858 年《璦琿條約》和 1860 年《北京條約》，俄國開始侵入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從而開啟了與朝鮮半島的接觸。俄國東進猶如美國的「天命」(Manifest Destiny)，都可歸因於一股莫名的推動力量，這正是陸權國家發展的原因。當年蒙古人西征，西方史家也有人稱其受到「魔鬼動力」之驅使，但若由此種先驗角度切入則

等於沒有解釋，因此歷史界還有另一言之成理的理由，亦即俄國東進目的乃為了尋找暖水港，以便獲取加入十六世紀以來海權時代的契機。為此，俄國在十六世紀末葉於托布爾河（R. Tobol）畔建立了托布爾斯克（Tobolsk）作為經略西伯利亞的根據地，然後循著三大水系循序漸進，終於在十七世紀末抵達太平洋濱，並於 1860 年取得海參崴一處天然暖水良港。俄國並不以此為滿足，於是決定繼續南下，目標是半島北岸的「永興灣」（今日元山，日本於 1904-05 年在此建立砲台要塞）。

俄國南下走向使半島上的利益衝突愈發複雜化；朝鮮部分少壯派政客為爭取出頭機會，嘗試組成親俄派自重。微妙的是，俄國與朝鮮結合跟中國干係頗大，關鍵人物是曾任李鴻章幕僚並由他委託前往朝鮮擔任外交顧問的德國人穆麟德（von Möllendorff）；李鴻章本意或是要他做為清廷眼線，不料他卻協助朝鮮獨立並牽線與俄國在 1884 年訂立通商條約。此時朝鮮也有在中日之外另循出路的打算，它既不想臣服於日本，亦不願繼續接受中國指揮，至於俄國南下正適時滿足了其政策需求。

進言之，俄國介入使東北亞三角關係產生了重大改變：首先是促使中日由利益「競爭者」暫時轉為「合作者」以共同抗俄，其次是英國也開始加入半島利益競爭，於是有了 1885-87 年的「巨文島事件」。英國不但是是一個傳統海權國家，也是第一個對俄國推動全球性封鎖（大博弈）的國家，自十九世紀中期後，便開始與俄國浮現密切頻繁的衝突，其潛在意涵乃海陸兩大強權的爭霸。英國成功沿著黑海、伊朗、阿富汗、西藏和中國的長江流域，對俄國進行了全面性圍堵，至於其東線終點正是朝鮮半島；英國對俄戰略既影響了美

國冷戰圍堵，1950-53 年韓戰背景也與此若相彷彿。

此時，日本內部意見陷入分歧，它被迫於依舊具宗主身分的中國和未來潛在威脅俄國之間選擇一個盟友，最終在「聯弱擊強」考量下選擇了前者。於是，在中日聯合加上英國介入下，俄國被迫轉趨低調，沙皇聲稱這些聯韓舉動只是遠東官員的片面作為，英國也交還巨文島表示其和平處理的態度。在整個交涉過程，清廷利用英俄矛盾居中斡旋，雖化險為夷地繼續維繫宗主地位，但兩國退還其既得利益則讓日本成為純粹的獲利者；它利用清廷壓迫朝鮮，致使部份朝鮮菁英因心生忿怒轉而親日，接著又利用清廷出頭暫時壓制了俄國野心，最後，趁機拼命自我建設的日本，終於在 1894-95 年取得擊敗清廷的機會。

甲午戰爭後的立即問題是：由誰來填補此一真空地帶？清廷影響力自此徹底瓦解，日俄則是未來可能的繼承者。特別是在 1900 年庚子拳亂後掌握了中國東北的俄國，由於可同時從北方與西面進入半島，對長久以來虎視眈眈將朝鮮視為禁臠的日本而言，無疑「是可忍孰不可忍」。根據當時解決重大紛爭的原則，武力是最有效且可靠的辦法。因此，日本在 1902 年與英國結盟後，隨即於 1904 年突襲旅順引爆日俄大戰，最終真正掌握了整個半島。

伍、英美之門戶開放政策

所謂「門戶開放」乃美國基本國策，但起源絕非僅海約翰（John Hay）一紙徵詢文書，而有其更早歷史背景。由於美國加入帝國主義者行列時間甚晚，既趕不上殖民拓張輝煌時代，且恪於「祖訓」（華盛頓教誨）緊守不與歐洲密切接觸之孤立態度，但在十九世紀中葉

迎來一波發展熱潮後，原料和市場之需求壓力迫使它必須想出突破歐洲全球殖民壟斷現狀並有利各國之對策，這一思想的結果便是「門戶開放」原則。1853年，伯理（Matthew Perry）到日本去推銷此一政策，讓後者成為美國在東北亞貿易重鎮。但此時它尚未注意到朝鮮半島；其後介入雖完全基於偶然，不過既有所接觸，開放此處市場乃成為其政策方向。

英國介入原因與美國不同。自從拿破崙戰爭之後，它已發展成海洋強權，基本利益是「維持海上航線暢通」，不能讓沿海勢力干擾其「自由航行」，至於俄國則是英國認知之一大威脅；在1703年彼得大帝遷都聖彼得堡後，俄國不斷在巴倫支海、北海、波羅的海和黑海遂行突破，希望由純陸權者變為兼具海權利益的國家。由於俄國幅員遼闊，且東進後同時面對大西洋與太平洋，使其可操作某種全方位的突破，尤其對土耳其與中國之蠶食鯨吞，更使英國在疑懼之下向俄國全球「開戰」，其中，最東線戰場即朝鮮半島。或許此種思考不過是一種心理作用，但當時英國確實懷有此一自保想像，從而讓朝鮮半島不自覺成為英國全球佈局最外圍一環。

當時中國對引進英美勢力興趣濃厚。主要原因是認知問題。清廷技術官僚普遍認為英美與日俄的最大不同，在於其貿易利益遠大於領土野心，因此可用其來制衡侵略國家；朝鮮方面也急於和英美接觸，以便擺脫中日影響並獲致真正獨立地位；至於英美更樂觀其成，以便達成開放市場終極目標。於是在三方各懷心機之下，1879年首先促成了美國與朝鮮談判締約。

最終在1882年簽訂的《美朝修好通商條約》，事實上是在中國主導下完成的，後者目的是希望藉此說明中朝關係，肯定朝鮮是中

國屬邦之附庸地位。但因美方代表薛斐爾（Robert Shufeldt）堅持其參議院不可能通過一個和非主權國家締結的協定，雖然雙方曾協調以「換文」（Exchange of Note）方式間接滿足中國願望，終究只是美國為達到簽約目的使用的欺敵手段。此後，德、英、俄、法、奧等國隨即各自與朝鮮締結了類似協定。

大體來說，歐美國家對朝鮮半島上權力結構之穩定維持是有正面意義的。尤其「權力平衡」概念被帶到東北亞，使朝鮮在 1880 年代獲得了短暫享受和平的機會。當然，這不全然是英美的功勞；一方面日本正埋頭建設並推動政治制度轉型，希望先完成「安內」工作，俄國則內部受恐怖主義和虛無主義威脅之餘，又因 1879 年德奧同盟以俄國為假想敵，致使它在內憂外患之際無暇東顧，於是英美得以將其薄弱政策推動於半島之上。等到日本做好準備（或因俄羅即將完工西伯利亞鐵路，被迫鋌而走險）揮軍西進後，他們也只能選擇在戰後繼續支持新的支配者。

陸、結論

從某種角度視之，十九世紀朝鮮國際地位及其內政動盪，不啻是依附於日本擴張陰影下演進的：以 1875 年江華島事件做為近代日朝關係轉變發端，1904-05 年的日俄戰爭最終奠定了日本對朝鮮的宰制力量，甚至導致朝鮮在 1910 年正式亡國。

若再從另一角度視之，則可發現各國對半島利益乃各有所圖且方法各異：中國著眼點在於威望與安全，由於其宗主國身分，使其可「合法」切入朝鮮內政，設法運作一套有利於己的行為模式；日本的利益則糾結於領土擴張，希望透過控有朝鮮，實驗明治維新成

果並躋身帝國主義國家之列，方法是「製造事件」讓它有機會取得發言權，最後再尋隙以戰爭貫徹目標；俄國的利益有些模糊，最終目標是取得暖水港口，途徑則是先將勢力伸入半島周邊以鞏固其太平洋濱的地盤，方法則是透過「派系勾結」滲入朝鮮內政，採取此種策略或因此時俄國在遠東尚無強大軍力所致；至於美國的目標純粹是經濟取向，希望透過「談判締約」解決需求；最後是英國，其利益具有多元化特性，在安全上希望圍堵俄國，在經濟上要求開放朝鮮，至於英國海軍與「霸權威望」乃其主要後盾。

由此可知，毫無疑問地，十九世紀末朝鮮之國際地位完全是一種典型的被支配者角色，作為利益角力對象，只能難以設防地任憑他人爭奪。進言之，朝鮮之陷入此種角色，主要或源自其地緣上的橋樑位置所致。凸出於大陸一隅之半島形勢使它長期受到周邊列強的關注。例如，其後爆發於 1950 年的韓戰或亦根源於此：儘管起因是金日成的統一野心，但因美國將半島視為防衛日本與用以制衡社會主義集團（中共和蘇聯）之前哨，且疑慮對方想藉由半島影響日本並突破其圍堵佈局，大戰於焉爆發，最終則帶來了迄今仍處分裂對峙之半島，並埋下北韓操作核武威脅之背景。